

# 科兹格茨·W·科勒德克：新实用主义——“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基石

如何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有力结合？是否能够统合实用主义经济学和基本伦理规则？这种结合是否有价值？如果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发展和谐，这种结合就是有价值的，而且是很可能实现的。社会再生产需要引进一种新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我们要时刻谨记——实用主义，其作为理性经济活动必要且基本的组成特征不可或缺。我们需要一种有利于多元文化发展的实用主义，其植根的价值体系则应该有利于推进包容性的全球化进程，有利于形成社会凝聚力，且能够促进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探索全面综合的、政策导向的、可以适用于未来发展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新实用主义，反传统、不断更新、跨越学科，能够超越GDP，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席卷全球的“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很大程度上就是依托于新实用主义的理论框架。

此种说法并不矛盾，因为引导经济发展进程的最高价值观和经济发展所要达成的最高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二者最核心之处都在于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总体可分为三类：

- (1) 经济可持续发展：商品市场、资本市场、金融投资以及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
- (2) 社会可持续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社会承认的收入分配制度，保证基本公民群体享受公共服务；
- (3) 环境可持续发展：探索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适当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或战略效益牺牲基本的原则。相反，我们要让以上基本原则统领具体的经济战略行动，而这种理念决定了未来政治经济发展进化的进程。

收入分配关系对于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支持，这个结论基于长时间的比较分析得出，无可辩驳。在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为持续有力。另外，较之于贸易自由化和政策规则约束，收入分配关系对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要更为显著。该结论证明未来发展政策需要集中在收入分配制度上。

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同时实现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因为通过改善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其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和经济政策却并未理解此种内在关联，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最后导致严重经济危机，最终毁灭自身的原因。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未掌握各类国家资本主义背后的经济学基本思想，这也是其前途黯淡的原因。现在已然是新实用主义的时代了。

我们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对立，但是这种二

元对立并非是未来发展的主流。以新实用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现存的两种主要经济学思想的对立中形成。在这场战斗中，新自由主义试图夺回其失去的影响力和学术地位，而国家资本主义则对新自由主义怀有深重敌意，两者在何为真正的社会经济进步问题上寸土必争。经济学应当尽可能面向广大群众，而不是局限在狭窄的“学术圈子”，仅仅符合小众的“特殊”利益，或者在政治、媒体、“科学”领域拿着高薪，当说客。任何一个经济学体系，如果大部分领域都是排外的、难以理解的、边缘化的，甚至是贵族化的，那么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事实表明，即使是多年来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得不承认，对于高度发达国家而言，不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如果想要战胜经济危机，其政策应当集中于提高税收水平（针对最富有群体），而不应该集中在减少财政支出（应用于最不富裕群体）。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一旦超过了一定的水平，社会满足感已无法通过大幅提高收入实现，而只能通过更为公平的分配制度实现，这对于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事实上，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这个结论对于教育体系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人们越是了解这个原则（社会满足感只能通过公平的分配制度实现），就越是容易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同时，这个原则也有一定的风险，基于此提出的假设可能会导向民粹主义，而非实用主义。此原则在衡量标准上也有一定困难，毕竟经济产出很容易衡量，但是涉及到人们的满足感，可人为操纵性就大大增加了。

显然，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基尼系数来增强满足感，而不是仅仅让GDP上升几个百分点，未来经济政策制定可以遵循这样的行动原则。这项原则很容易实施，一方面，整体的产出和消费水平在上升，另一方面，如今收入分配不平等亦更甚从前。换句话说，消除不平等的可操作空间大得多。在不发达国家，长时间以来经济增长处于首要地位，与之相反，除了比较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以外，大多数发达国家需要采取的最重要举措就是适当的改善经济分配制度。

此外，我们要坚决反对不平等，尤其是由于分配不公导致的不平等。分配不公削弱了人们之间的信任，进一步影响社会资本运作，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影响。如果各类专业、社会团体之间缺乏信任，如果社会不再信任权威，而专家也不再信任社会大众，如果企业家之间不再互相信任，社会资本不会（因为谨慎）增加，反而会大大缩水。在经济体制中，就像在家庭中一样，就算钱财富足，如果信任缺失，关系仍旧会崩塌。

人类无休止的欲望，加上随之而来的无法抗拒的想要满足欲望的想法，是一把双刃剑。这欲望让人类克服难关、一直以来刺激着经济发展，是社会再生产过程或者说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润滑。但是，欲望也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它蒙蔽思想、让人沉溺享乐、耽于堕落，同时他也是非理性经济活动的罪魁祸首。

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危机只是稍稍抑制或者仅仅是推

迟了消费欲望，这种欲望也是特殊价值体系的产物。几个世纪以前，人类突破了简单的社会再生产循环，至此人类的欲望就再也难以满足，以前的在生产过程中同样规模的生产和消费可以不断循环往复，而后来每一轮生产消费都要比前一轮循环增加许多，这种消费欲望就再也无法轻易得到满足了。在古代，人们需要的仅仅是和前人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平，现在，则是越多越好。那么真的越来越好了么？不论我们生产了多少，我们消费了多少，我们都需要更多的东西。得陇望蜀、欲壑难填，过度消费十分猖獗，而这种经济狂欢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经济体制需要健康的消费，就像是好身体需要健康的食谱一样。未来经济需要中庸模式。

虽然需求满足程度在增加，需求本身却增加得更快。导致的结果是，虽然经济增长在持续，需求和满足需求之间的沟壑却在扩大。即使人们拥有更多，情况却变得更坏了。本质上，这是一种心理问题，却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我曾经将这种症状称为“高消费低满足悖论”。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清楚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将陷入这样的怪圈——我们始终在生产更多商品却丝毫没有满足需求。如果这种过度生产造成环境大规模破坏、社会极度动荡，那么我们行为的意义在哪里？

如今社会再生产的逻辑框架是：自然增长的消费需求以及消费各类商品的行为，会反过来刺激生产本身，同时，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人的收入也会增加。事实上也是如此，消费需求本身，在消费至上的年代，通常要比消费满足的程度高得多。因此，经济增长背后的动力和对于现行生存状态的不满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如果欲望增长超过了经济生产可以满足的极限，那么个人和社会的失落感都会加剧。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控制这种症状：降低欲望增长的速度。

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呼吁提高生产增长的速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当提倡的，不论是从道德伦理角度还是别的角度。另外，现行的再生产机制的关键在于加速经济增长会导致更快的消费欲望的增长，最终，这个体系再次面临着同样的症状，那时候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怎么办呢？市场本身永远不会自觉自发的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相关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用其规章制度和人力投入来增强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越强，改造消费欲望的能力就会越强。值得补充的是教育对于我们的消费欲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欲望就会越朝着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方向转变。仅仅收入增加，相应的教育程度却不增加是不行的。教育对于经济有着特殊的影响，随着教育程度加深，消费需求的结构改变，相应的商品服务供给的结构也会随之改变。举个简单例子：少喝点儿伏特加酒，多看书。抑制对于前者的消费欲望，而后者则值得增加消费或供给，甚至可以用财政手段来推广。

如果我们问一个教育工作者怎么抑制消费欲望，他会说：通过教育和培养。如果问一个牧师，毫无疑问他会说：宗教塑造消费习惯和行为。如果问心理学家则会建议我们要培养正确的性格特征。如果问一个社会学家，则会建议我们建立有吸引力的社会互动机制，寻找消费替代品。

而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知道：放任自流，然后夸夸其谈皮鞋锃亮的男孩变成百万富翁的故事，或者，在我们的时代，就是讲金融名校毕业的学生通过股市投资成为富人的故事（当然，必须得是这个学生想这样做，没什么别的顾虑）。但是，一个诚恳的经济学家会从跨学科的观点和实用主义的角度来阐释问题。首先，他会想办法学习尽可能多地提到以上的原则，然后基于价值观、制度、政策，在整个发展框架中提出一系列长期措施。同时，他会时刻谨记人们想要什么取决于他受过的教育。

毕竟，我们没法消除主观欲望和客观实现手段之间的差距，前者增长总是快于后者，除非我们重新定义人类，那么不论是个人欲望还是社会欲望都会相应被重新定义。要想缩小欲望和实现手段之间的距离，我们必须抑制“错误”的欲望，推崇“健康”的欲望，比如刺激人们运动或者阅读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要诉诸于特殊的政策手段，最关键的是不能让社会阶层间财产收入的差距过大。

毫无疑问，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我们需要野心。不是不切实际的野心而是实实在在可以达到的目标，“一带一路”就是这样的目标。没有目标很难走得更远，爬得更高，但是过度的无法实现的目标也只会令人沮丧。过度的目标只会阻碍发展，而不会促进发展。各级领导，都应该有着高瞻远瞩的眼光，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野心、企图都必须植根于切实的文化经济潜能，而不能仅仅出于民粹主义的考量做出轻率承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想要赶上富裕的邻居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不是异想天开想要立刻赶上最发达国家。墨西哥人想要赶上美国，斯洛伐克人想要和奥地利一样，爱沙尼亚人和芬兰较劲，越南则是计划赶上泰国。当然，中国梦想着能够在下一代弥补曾经的时间差距，追赶上发达国家。

想要赶上更富裕国家的愿望是消除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如果计划的任务在一定时间框架中不可能完成，人心会涣散沮丧。我们要做一个有野心的实干家，目标设定在努力就可以达成的程度很重要。如果你可以达成目标，那么就可以增强能力，绝对不要把目标设定得太高，超出了你的潜能可以达到的范围，因为这样的话你的目标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最终你得到的绝不会是成就感和满足感，而只有挫败和失落。

我所谈论的并不是限制人们的欲望，而是在各种欲望中力争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在不断增强的原有欲望，刚刚出现的新欲望，和现实合理的经济框架内实现这些欲望的可能性这三者之间达到和谐状态。就如同提起未来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最好是能够给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有更多的空间，而让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稍稍受些限制，以达到整体和谐的状态。很大程度上，这和“暴食”有些类似，吃到了某些程度，你会厌倦你喜欢的食物，没法再进食更多。

如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力求在一定的经济活动范围中将社会满足程度提升到最高，我们需要从新实用主义找办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出发，而这正是新实用主义的核心和方法论。

实现人们的欲望，使人们获得满足感，这一发展目标与新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一致。GDP的增长仅仅是通向目标的一个方法，而不是目标本身。现在是时候让发达国家将目光从提高国民收入上移开，也就是将焦点从尽可能增加GDP产值这一目标上移开。如果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并未给富裕的美国人以满足感，为什么还要继续努力提高收入，花费甚巨，甚至不惜延长工作年限，破坏自然环境呢？

我提议一种不同的经济进步衡量指标，我将其称为综合成功指数 (Integrated Success Index)，简称 ISI。它仅部分依赖于 GDP，因为这一综合指数的值也是由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具体而言，ISI的总值包含：

(1) 国内生产总值——40%；

(2) 主观福祉，与总体生活满意度相关，包括社会服务标准，以及对其未来前景的预测——20%；

(3) 对自然环境状态的评价——20%；

(4) 对闲暇时间以及填补闲暇时间的文化价值观的评估——20%。

该提议的指标虽有相当的任意性，但它并非是强调细节，而是要展示一系列的探究。我们能否从当前的混乱局面安然脱身，取决于是否紧迫地重新定义经济发展目标。因此，我并不坚持 ISI，它仅是一个总体概念而非一个操作性的量度指标，在此我们可以提倡最广泛地、甚至可能统一地使用经不平等调整的人类发展指数 IHDI。现在是时候要求政治家们严肃对待这一事务了。

新实用主义，能够将相关经济政策、措施和普遍的经济学原理概念相结合，把握“中庸经济学”的本质。“中庸经济学”的含义就是让人类、自然、金融、物质财富形成动态平衡。过去几十年的动荡皆是由于各领域的严重失衡以及失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造成的。我们的经济学总是处于永久的失衡之中，不是多了这个就是少了那个，这里有了多余的部分，其他部分就会处于匮乏之中，但是发展良好的经济学应当是适度恰当的。因此，我们要致力于一种完美的状态，即“中庸经济学”。

以后我们会愈发需要中庸经济学，而不是过度、失衡、引发危机的经济学。过度、失衡、危机在人类社会和国家经济进程中会反复出现，但是应该让他们成为例外而不是常态。我们应当遵守规则，知道哪里必须停止，哪里可以适度改变，适应经济发展机会；我们可以有适度的收入差距，但不可以让收入差距大到让大部分人受害，甚至导致新的革命；我们要警惕疯狂的市场营销刺激起的消费欲望，这种欲望和可以满足的有效需求相距甚远。我们应当遵循规律，在改造自然，生产商品的时候不要做过头，尤其是当消费使用这些商品已并不能提升消费者的满足感的时候。

新实用主义需要政府发挥协调作用，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要协调经济政策，更正，或者说是完善市场进程。有道是：“洗净宝贝，倒清脏水，如果宝贝可以

自己洗澡，那更完美，但我们绝对不能不给宝贝洗澡”因此，我们需要调动政府干预经济的各种手段，但是科要牢记不要混淆经济手段和经济目标。保证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均衡发展十分重要，但是这仍旧只是一种达成目标的政策手段。我们需要推动，而不是抑制经济发展均衡。

不要让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算是老生常谈，曾经就有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没能达成经济目标的例子。毕竟，市场会出错，政府和央行也是一样，而且政府还经常出错。在这个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政府间乃至世界联系愈发紧密的时代，政府的规章制度不仅仅是用来应对过去发生过的问题，同样也应该面向未来。政府规章更多是为了避免未来经济发展走入歧路，重大失误，监管疏漏，或者欺诈横行的，而不仅仅是去解决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一旦出现上述问题，我们应当采取向公众道歉、斥责相关责任方、迫使责任人离职、惩罚罪魁祸首，甚至将其投入监狱等手段。很多事故或者灾难发生之后，相关技术监管都会更加严格，但是事实上应当在出事之前就做好这些，从灾难的源头扼制一切。飞机失事了，航空公司开始注意从前未曾注意过的技术事务，但他们本来应该在空难之前就做好检查；洪水冲破了几十年没有检查加固过的堤坝，水利部门从那以后开始加强监控，但实际上他们本来应该在出事之前就做好检查，避免这场天灾。

系统有序政府干预能够弥补市场最基本的短板，弥补由此造成的过度失衡的收入分配差距，但绝不可以直接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政府干预一定要避免将个人损失社会化，否则，日后的市场发展中，政府干预很可能会成为个别人满足私欲的手段。令人倍感讽刺的是，如今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将一些私人的财产损失转嫁到纳税者头上，这是政府干预不良的一方面。

政府干预也有更坏的一面，在世界上各种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官官相护、派系横行的现象十分严重，远比自有资本主义时期严重得多，政府的规章制度更多的是为了一些门阀派系服务，在政治、官僚、经济等方面发挥作用，而不是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手段而发挥作用，这和自有资本主义中商业欺诈对于诚信企业的戕害一样可恶。

这种恶劣的政府干预只有通过公正的法律和秩序，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强有力的制度，有序的国家机构等来斗争。这也是为什么自有资本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小政府”或者说“廉价政府”，因为小和廉价意味着政府没有效力且十分弱小。如果能够让政府弱小，但同时却不削弱它干预市场的能力，那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政府势必变得“更大”，“更贵”，因为公共服务一般花费甚巨，尤其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开支更是昂贵，因此造成这个“更大、更贵”的政府自然比“更小，更廉价”的政府成本要高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如果没有制定出合理的经济计划，那么很可能没办法将糟糕的金融业挽救回来，而欧盟同样也没法清理好欧洲金融业。中国就很清楚经济计划的重要性，其处理相关问题时就是使用计划的手段。目前的中国仍旧在制

定五年的宏观经济计划，但却不再是行政命令式的计划，而更多的变成了战略性或者说指导性的经济计划。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阶段（目前在实施的是十三五规划，有效期为2016-2020），经济计划中命令成分少了，市场成分越来越多。印度也采用了指导性的经济计划，这种经济计划手段没有放弃政府对市场的监控和干预，但同样也在逐步消解政府控制，二十年来，经济计划的实行平稳而合理，有效避免了自有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很容易看出新实用主义与补缺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一致，后者声称，全球化程度越高，政府就会“越大”，或者说，公共支出与国民产值的比率上升。自然，目标是做到支出总额与世界生产总值，即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的相对化。终究，在有些国家中，通过削减这些支出（效率假说所称的调整）能更好地服务于可持续发展，但也有另一些国家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财政再分配。

我接下来要讲的方法，不满足于仅仅预测未来，而是提供了一种干预未来经济发展的更深层次的机制。这种方法为未来经济提供了更有活力的发展路径，为实现预定经济目标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这方法能够应用于未来经济发展中，让使用者能够得出正确结论，做出正确决定，包括多样化预测、多样化备选方案、预见式思维以及微观可行性经济实验等。

新实用主义表达了一种针对未来的战略性方法。它对全球愿景或警告性预测毫不陌生，但在原则上，它有着一种针对未来的积极主动的方法。好的经济学不只是对世界的描述，它还是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一种工具。考虑到长期发展趋势，值得制定出战略来帮助它们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定向，这将更容易地解决不止一个问题，避免不止一次经济灾难。

因而，新实用主义是我较早前作为“发展的契合理论”（Coincidence Theory of Development）而提出的描述性观点的规范性产物。它强调了多个发展决定因素的某种既定同时发生（契合）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同时发生总是具体的，但因时间和空间而不同。“事物以现在这种方式发生，是因为有很多事都在同时发生”这个句子简洁地传达了 this 概念。在将来，该规律将总是适用的。从描述、分析、解释过去所发生的以及当前正在发生的开始，我们得以评估并假定措施，预期它们在将来会导致一系列的具体现象和过程，其产物是所渴求的方向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其决定性因素将是各种组成部分的契合，或吻合和聚合、相互叠加和渗透，它是多层的、异质的“点金石”，将来可能让我们得以开展原本不可能的行动。

科勒德克教授是老虎智库（TIGER转变、一体、全球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的创始人也是执行总裁，同时科勒德克也是流行各国的畅销书作者，他曾撰写《Truth, Errors, and Lie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a Volatile World》（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这本书被提名米歇尔·海灵顿奖

提名，被誉为“展现了如何用学术知识改造更美好的世界”的一部杰出的作品。这本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其中文书名为《真相、谬误与谎言：多百年世界中的政治与经济》(北京外文出版社，2011年出版)。科勒德克的博客地址是：  
[www.volatileworld.net](http://www.volatileworld.net)